

中國哲學史

上册

馮友蘭著

中國哲學史 上冊

中華書局

馮友蘭著

中國哲學史

冊

中華書局

本書系用商務印書館舊版重印

國哲學史

(全二冊)

馬友蘭著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號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3 壓米 1/32 · 39 9/16 印張 · 527,000 字

1947 年 10 月增訂 8 版

1961 年 4 月北京新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2018·59 定價（9）5.40 元

新序

这部书是完全从資产阶级的阶级立場，以資产阶级哲学观点，用資产阶级历史学方法所写的中国哲学史。現在把它重印，似乎只有一点理由可說。

北京曲艺中的相声，經常要用两个人說。一个主角从正面發揮主题，一个配角从反面提出辯駁。經過辯駁，主题就可以逐步发展，以达到最后的頂峯。現在各科学領域內，都展开了百家爭鳴。這部书的重印，大概可以起从反面提問題的作用。这就是說，在中国哲学史的領域內，这部书可以作一种反面教材。

这部书是作为一个历史材料重印的。既然是作为反面教材，其中的錯誤，也就不必改了。其中引用背叛祖国的反动分子胡适、傅斯年等的話，也都照原样未加改动。他們的名字，本来是只在作为批判对象的时候，才可以出現于新中国的刊物中的。

这部书的錯誤是立場、觀点和方法上的根本錯誤。枝枝节节地改，不解决問題。要改就須从根本上全盤地改。这就等于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我是准备这样作的。

我們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在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学术界和艺术界，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奇景壯觀。这样的大好形势以及党的培植和領導使我相信我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还写了一首诗：

旧书重印愧前贤，腐臭神奇事倒颠。
异卉妙音盈大地，好将新作报春天。

馮友兰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自我批判

一部哲学史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它有它对于历史的看法，这就是它的历史观。它有它对于哲学的看法，这就是它的哲学观。它对于历史中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对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必然有分明的爱憎和明确的抑扬，这就是它的党性。它的爱憎和抑扬必然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这就是它的阶级性。

根据这四点分析一部哲学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它的本质。

(一) 这部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观

这部中国哲学史所持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观呢？它分别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前者指过去事情的本身，后者指历史家对于事情的叙述，即「写的历史」。它说：「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絲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識。」(中国哲学史頁一八)它虽然认为有客观存在的历史，但是又認為它的真象是不可知的，历史家不可能写出跟它完全相合的历史。它說：「馬克斯諾都有言：客觀真實之于写历史者正如康德所說『物之自身』之于知識，写的历史永远不能与实际的历史相合。」(中国哲学史頁一九)这完全是一种不可知論的历史观。

历史既然是客观的存在，它当然是可知的。历史家对于客观历史的知识，就跟人们对于任何客观

存在的知識一样，都有一定的相对性，但是人的知識是逐步提高的，是逐渐接近于它所反映的客觀实在的。相对的知識积的多了，就接近于絕對的知識。历史中誠然有許多我們还不知道的东西，但是这并不說明历史是不可知的。

不可知論的历史觀，是把历史知識相对性絕對化，由此得出結論說，「写的历史」在原則上不可能跟客觀历史相符合。「写的历史」永远要重写；无论如何重写，总逃不出历史家的主观的范围。

当时的馬克思主義史学家正在初步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史論戰」已經展开。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历史学不但要叙述历史中的事情，而且要揭露这些事情的阶级斗争的本质，不仅要认识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而且要发现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样就可以把握历史的本来面目。

可是在資产阶级历史学这一方面，胡适正在宣传他的实用主义的历史觀，認為历史「好象一个百依百順的女孩子，可由历史家随意装扮」。我的这部书虽然認為历史有独立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本来面目，但是它在原則上是不可知的，历史家写出来的历史还是他随意「装扮」出来的。这样的說法的邏輯的結論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也不过是一种『装扮』历史的方法。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研究出来的历史，也不过是在这种『装扮』下出現的『女孩子』。她的本来面目是不是这样，这是在原則上无法知道的。」

这是当时馬克思主義史学家和資产阶级史学家两条战綫斗争中所牽涉到的一个根本問題。在这

个問題上，這部書所依據和所宣傳的歷史觀，正是資產階級歷史學陣營中的一个重要支柱。

(二) 這部中國哲學史的哲學觀

這部書也會企圖用社會的原因說明中國哲學史的發展和變化。它指出中國歷史中有兩個大轉變的時代，一個是春秋戰國，一個是近代。社會上的大轉變也引起了哲學上的大轉變。這也算是臥識到歷史中的一部份的現象，但是並沒有解決問題。在同一个轉變的時代，哲學家們都在同一的「新環境，新時勢」之中，為什麼他們會有不同的意見呢？為什麼這些不同的意見要展開激烈的鬥爭呢？當然這是由于他們有不同的階級立場，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他們的思想鬥爭，就是當時階級鬥爭的反映。

這正是問題的本質所在，正是哲學史所要說明的。

可是關於這些，這部書就不談了。為什麼在同一個轉變的時代，各哲學家有不同的見解呢？這部書引用實用主義的一個創始人詹姆士底說法，認為「哲學家各有其『見』」，又以其「見」為根本意思，以之適用於各方面」（中國哲學史一二頁）。這就是這部書所依據和所宣傳的哲學觀。照這種唯心主義的哲學觀，哲學的根源並不是社會階級鬥爭，而是天才的哲學家所有的「心眼」或者「慧眼」所有的「見」。但是，這還不能解決問題。哲學史上的哲學家為什麼會有不同的「見」呢？這部書又認為這是由於哲學家的性情氣質的不同。它又引詹姆士底說法，認為「依哲學家之性情氣質，可將其分為二類：軟心的哲學家和硬心的哲學家。軟心的哲學家的哲學是唯心論的，宗教的。硬心的哲學家的哲學是

唯物論的，非宗教的」。这种荒謬的見解，不但完全无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阶级根源，也对于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极大的譏蔑。唯物主义，特别是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并不是象詹姆士所胡說的，「将宇宙間有价值的东西概归纳于无价值者」，也不是象他所胡說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时也是命定論的，多元論的」（以上見中国哲学史頁一五）。

在說到荀子的时候，这部书果然就用所謂「軟心的」，「硬心的」氣質不同这种荒謬的說法，解釋荀子与孟子所以不同。它說：「孟子乃軟心的哲学家，其哲学有唯心論的傾向。荀子为硬心的哲学家，其哲学有唯物論的傾向。」（中国哲学史頁三五二）照这种荒謬的說法，孟子荀子所代表的两个对立斗争的唯心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体系，其出現只是出于偶然。假使沒有象孟子那样「軟心的」人，也就沒有象他所代表的唯心主义体系。假使沒有象荀子那样「硬心的」人，也就沒有象他所代表的唯物主义的体系。这样，哲学史的发展，就完全是些偶然事情底堆积，沒有規律，也不可能有規律。这种說法是完全跟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哲学中的两大阵营。唯物主义思想經常跟社会的进步阶级相联系；唯心主义思想經常跟反动阶级相联系。这是阶级斗争在思想中的反映，也是哲学史发展的規律。就中国哲学史說，孟子是拥护当时的世袭貴族的，他认为有主宰世界的「天」即上帝，宣传「君权神授」等唯心主义的学說。荀子是拥护当时地主阶级的，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觀，反对宗教，对于孟子有尖銳的批評。

这种思想斗争，是先秦哲学发展的规律的具体表现，绝不是偶然的。

这部书又认为，不能就一个哲学体系在当时发生的社会影响判定它的价值。它认为一种学说有其内在的价值，那就是它的「見」和以它的「見」为中心所构成的一种理论体系。它认为哲学首先是一种理论；只要有理论，就算有贡献。它说：孔子以及以后的儒家「与旧制度以理论的根据」，「儒家之贡献即在于此」，其余各家的贡献也在于它们能「说出其所以有其主张的理由，与之以理论上的根据。荀子所谓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中国哲学史頁三六）。它认为一个学说的价值就在于它「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这就是把一个学说的体系和它的社会根源及客观影响割裂开来。这样，在历史上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思想，和开倒车的反动思想，就沒有好坏可分了。历史上的哲学，来源于哲学家的「見」，跟当时的社会情况、阶级斗争，好象沒有关系。它好象是一个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孤零零的东西。这种对于哲学史的看法，在后来我的新原道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这是资产阶级学术中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的一种表现。当然，这种思想本身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它的实际的效用就是不必说明中国的封建哲学对于现在社会有甚么害处。这也是保护封建哲学的一种办法。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一种学说，如果有一定的价值，其价值就在于它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正

确地反映客觀实在，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經濟向前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羣众的利益。

这部书反对从一家哲学的客觀效果上对于一家哲学作評价。那就是不管它与当时社会經濟向前发展需要的关系，不管它对于人民羣众利益的态度，又从不可知論的观点，認為除了看一种哲学是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之外，沒有方法决定它是否反映客觀存在。因此，这部书就認為一家哲学的价值的大小，只在于它的理論体系是否完整細密，不問他反映客觀存在达到何種程度，因为这是不可知的；也不問他是否符合当时人民羣众的利益，因为这是不必管的。

哲学史上有許多派別，其理論体系都很完整細密，但其主张完全相反。因此，在这部书就得岀結論說：哲学本来是跟科学不同，而跟文学宗教相似。「蓋一切哲学問題，比于各科学上之問題，性質皆較广泛，吾人对之，尙不能作客觀的研究，故其解决多有待于哲学家之主觀的思考及其『見』。故科学之理論，可以成为天下所承認之公言，而一家之哲学，則只能为一家之言也。」（中国哲学史頁一四）照这种看法，哲学本来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學問。

（三）这部中国哲学史的党性

我當時認為，这样对待哲学史中的哲学派別是一种「超然态度」。我把資产阶级的客觀主义，說成是科学的客觀态度。我當時認為一个好的哲学史家，在講那一家哲学的时候，就要站在这一家的立

場，把他的思想用同情的态度重想一遍，然后不增不減地加以敘述，还它的真实面貌，給它以应有的地位。这就是哲学史家的任务。我經常在課堂对學生說，講哲学史，对于各派的思想，除了看其是否能「自圓其說」，能否成为体系外，不可对于它有所批判。因为如果有批判，那就是站在某一个哲学家的立場，是講哲学而不是講哲学史了。这就是說，哲学史家对于哲学史中的各派，不可有愛憎，也不可有抑揚。

这完全是欺人之談。这部书对于唯心主义哲学，是有同情的了解，这是事实。但是，照它的同情了解所描写的哲学史中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不是它的真实面貌呢？当然不是。它所描写的只是唯心主义哲学所戴的假面具。它的假面具之下所掩盖的本质，是用荒謬的理論歪曲真理，麻醉人民，为統治階級服务。

馬克思主義的科学的哲学史是要以客觀的态度，揭示哲学史的真相，不增不減地加以敘述。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不能止于照着哲学家們自己所說的詞句，去描写他們的思想。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正如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們的竞选演說一样，都充滿了美好崇高的詞句。但我們所要知道的，不是他們所用的詞句，而是这些詞句的真正內容。这就要加以分析，加以批判。分析、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說明哲学家的思想的真正面貌。

不管这部书表面上怎样說，它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有分明的爱憎和明确的抑揚的。例如

荀子和孟子、庄子是先秦哲学中的重要对立面。这部书对于孟子和庄子的唯心主义哲学，特别「同情」。对于荀子所注重发挥的，不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而是他对于「礼」的辩护。王充和董仲舒是汉代哲学的主要对立面，对于他们，这部书的爱憎就更分明，抑扬就更明确了。它认为董仲舒是汉朝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它说：「此时之时代精神，此时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中国哲学史頁五〇二）又引汉书的话说：「董仲舒为羣儒首，为儒者宗。」又断定说：「董仲舒在儒家之中之地位，观此可見矣。」

（同上，頁五〇三）。

对于反抗董仲舒的王充，在这部书里，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这部书对于王充的思想，还加以批评，认为「論衡」多攻击破坏，而少建树，故其书之价值，实不如近人所想象之大也。（同上，頁五八八）。

又說，王充「亦主有其所謂命，并主有符瑞之說，可見时代影响之大，虽持异之士，亦有时难自拔也」（同上，頁六〇〇）。这就是說，王充的哲学，作为一个理論体系看，不够完整細密，有些不自相一致的地方，不能算是第一流哲学家。

对于王充，这部书就是这样，不論其反对迷信和唯心主义的社会意义，专就他的理論体系上吹毛求疵。就是专在理論上說吧，立跟破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能立然后才能破。这部书既然承认王充能破，怎么又說他沒有立呢？王充当然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不可以把它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迷信混为一談。

宋朝以后的封建社会的正統哲学，是程朱哲学。这部书特別拥护它，并且用資产阶级哲学新实在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把它加以發揮。宋明以后，反程朱的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前有王夫之，后有戴震。王夫之是中国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一。就按理論体系說，他的哲学思想也是完整細密的。可是，在这部书一千多頁的篇幅中，仅給王夫之兩頁的地位，仅只是提到而已。

至于对于戴震，这部书就站在朱熹的客觀唯心主义立場，公开提出批評。并得出結論說：「由上所述，吾人可見东原之学，实有与宋儒不同之处；但东原未能以此点为中心，尽力發揮，因以不能成一自圓其說之系統。此东原之学，所以不能与朱子阳明等匹敌也。」（中国哲学史，頁一〇〇八）这也就是說，戴震不是第一流的哲学家。

这部书写成以后，我在自序中說：「历史中之『是』与『應該』，頗多相合之处。人类所有之真、善、美，历史多与以相当的地位。其未得相当的地位者，则多其不真、不真善、不真美者也。」（中国哲学史自序（二）頁一）

可是「是」与「應該」是有阶级性的。这部书所認為是「是」的和「應該」的，只是資产阶级的「是」和「應該」。人类所有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中固然要占应当有的地位，但是封建的和資产阶级的历史家，却不肯也不可能給他們以应当有的地位。这些历史家所叙述的优良传统，只是地主阶级和資产阶级的「优良传统」。至于劳动人民所有的优良传统，在这些历史家的著作里，是没有地位的。只有馬克思

主義的科學的历史，才能給人類所有的真正的優良傳統以它們應該有的地位。

毛主席說：「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从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証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於人民羣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後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新民主主義論，毛泽东選集第一版第二卷頁六七九）

（四）這部中國哲學史的階級性

這部書的分明的愛憎和明確的抑揚，正是「頌古非今」，「讚揚封建的毒素」。對於人民羣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引導他們向前看，而是引導他們向後看。它是「五四」運動的一個對立面，是「五四」以後一段時期的一股逆流。它跟當時的國粹派和國故派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不同的，不過是它用了一些資產階級哲學史的方法，注入了一些資產階級哲學思想。正是為此，在國粹派和國故派的腐朽東西已竟迷惑不了人時候，它還能起一種迷惑人的作用。

毛主席說：「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在當時，這種所謂新學的思想，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鬥爭的革命作用，是替舊時期的中國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可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被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壳了。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第二卷頁六六八）這部書正是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的一部分。

這樣的同盟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是為鞏固這種社會的基礎服務的，是為這種社會的統治階級（包括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服務的。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哲學思想，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也只能起奴化人民的作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里，它跟本地原有的封建哲學結合起來，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就更能起這樣的作用。這樣的結合，成為雙料腐朽的東西。它一方面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習見的形式，一方面又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不習見的內容。它們互相補充，互相支援。帝國主義和本地的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本來是互相補充，互相支援的。資產階級哲學和封建哲學的結合，就是這種事实在思想戰線上的反映。從資產階級立場，以資產階級哲學觀點，用資產階級歷史學方法，所寫的哲學史就是這種結合的一種方式。